

#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2 年第 2 辑

总第 20 辑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2年第2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宁 斯大林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5印张 195,000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750

书号 17001·98 定价 0.80元

(只限国内发行)



#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 1982年第2辑(总第20辑) 目 录

- 新发现的马克思的一封书信 ..... 杜章智译 (1)
- 马克思致露美列的信(1853年3月10日于伦敦) ..... (1)
- 附译者说明 ..... (3)
- 奥古斯丹·梯叶里和唯物史观 ..... [俄]格·瓦·普列汉诺夫 (8)
- 王荫庭译
- 列宁是怎样制定“辩证法的十六要素”的？  
..... [苏]波·米·凯德洛夫 (25)
- ..... 之摘译
- 关于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七卷的手稿  
..... [苏]C. 格里哥里扬 (37)
- ..... 京祚译
- 马克思 1850—1853 年的伦敦笔记  
..... [德]克劳斯·福利克 沃尔夫冈·约翰 (43)
- ..... 京祚摘译
- 马克思 1850—1853 年期间的经济学研究 ..... [苏]亚·马雷什 (58)
- ..... 马 今摘译
- 马恩列斯著作中社会主义概念的初步探讨 ..... 肖贵毓 (77)

2F78/03

苏联五十年代中期关于列宁《党的组织  
和党的文学》一文的论述材料

论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

.....〔苏〕Я.М.斯特罗奇科夫 (97)  
高叔眉摘译

不竭的泉源 .....〔苏〕Я.М.斯特罗奇科夫 (112)  
高叔眉摘译

要正确地解释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一文.....〔苏〕З.盖尔什科维奇 (121)  
高叔眉摘译

新经济政策研究资料(二).....刘彦章等编译 (127)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租让

列宁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的研究(摘译)

.....〔苏〕А.科索 (127)

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国家资本主义.....〔苏〕В.卡巴诺夫 (140)

谈谈苏维埃国家在欧俄北部地区森林工业中

的租让政策.....〔苏〕А.基谢廖夫 (144)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

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和合作制.....〔苏〕А.莫洛佐夫 (149)

新经济政策和农业合作制.....〔苏〕Л.法国 (161)

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对于社会主义

关系在农村取得胜利的作用.....〔苏〕Е.奥斯科尔科夫 (167)

新经济政策和集体农庄建设.....〔苏〕А.奇梅加 (171)

二十年代对国营农场经营原则的研究.....〔苏〕И.捷列宁 (177)

## 文献和资料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通信集(三)……………沈 澂、蒯启发译(183)

## 人物传记和回忆

1918年列宁受伤后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

……………〔苏〕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  
冯连付摘译(194)

## 思想流派

东欧、中欧的新马克思主义(二)……………〔西德〕蒂·哈纳克  
赖升祿、张念东译(201)

4.“布达佩斯学派”……………(201)

a) 历史概述……………(201)

b) 布达佩斯学派的哲学……………(205)

5. 哲学的“布拉格之春”……………(209)

a) 1968年以前的意识形态发展……………(209)

b) 哲学问题……………(213)

6.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持独特见解的哲学家……………(217)

介绍西方学者对葛兰西政治思想的述评……………毛韵译(221)

## 国外学术讨论

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尝试

——日本哲学界评东德的“哲学体系争论”……………高晶晶编译(240)

答  
读  
者  
问

列宁是否批判过“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  
哲学能否概括为“斗争哲学”?

“斗争哲学”小议……………金守庚(262)

# 新发现的马克思的一封信

## 马克思致瑟美列的信

1853<sup>1</sup>年3月10日于伦敦

我已经收到您最近的来信。您一定已经读到科苏特的各种解释。在马志尼的解释还未出来之前,我就知道,他给他在此地的一个朋友,一个英国人,写过一封关于科苏特的**很厉害的私人信件**。关于这事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如下一段话:<sup>2</sup>

既然现在马志尼本人已经打破沉默,那末我也可以告诉大家,科苏特在他巴黎的朋友们的压力下已经否认了他自己发表过的文件。在科苏特以往的活动中我们就看到过许多这种优柔寡断、极端矛盾和模棱两可的表现。他具有一切令人喜欢的优良品格,但同时也具有**一切典型的女性的缺点**,即所谓“演员的”气质。en paroles〔就言词方面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大演员。“谁要不愿意为流行的偏见所左右,而希望有自己的以事实作为根据的见解”,那我就介绍他读一下不久前出版的、瑟美列先生所写的一本路德维希·鲍蒂杨尼、阿尔都尔·戈尔盖和路德维希·科苏特的传记<sup>3</sup>。我的所有文章我都署名的。现在一定会有攻击,所以我将有机会进一步深入谈这件事。如果您能把您听到的关于流亡者、特别是关于 Par nobile fratrum〔高贵的兄弟俩〕<sup>4</sup>的任何新消息尽快地告

诉我，我将非常感激。只要有一点那样的资料，我就能够在《论坛报》上谈论这件事。

至于泽尔菲，我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看到他了，我的确对他说过，如果我认识科苏特本人的话，我将感到有义务提醒他，要他提防班迪亚。泽尔菲在我看来喜欢饶舌而且不大谨慎。不过，我决不认为他与班迪亚是一路货色，我认为他是诚实的。

两千册我的《揭露科伦案件》<sup>5</sup>（1852年12月6日寄往瑞士出版）三个月后在巴登边境被没收了。我深信班迪亚在这件事上也插了一手。C'est un infâme qu'il faut écraser〔这是一个应该粉碎的无耻之徒〕<sup>6</sup>。

普尔斯基大约四个星期以前到美国去了。我认为科苏特派他到那里去，是为了挽回他在报界已经下降的声誉，并且策划阴谋对付他的敌人。普尔斯基还将设法在《纽约论坛报》诋毁我，但是我预言他不会取得很大成功。

非常尊敬您的

查·威廉斯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杜章智译自美国  
《科学与社会》杂志1980年第4期）

- 1 原文为1852，系笔误。
- 2 以下直到“路德维希·科苏特的传记”为止，原文是英文，这是《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3月22日刊登的马克思的通讯《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中的一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621页。
- 3 全名是《路德维希·鲍蒂杨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活动家的政治概述》（汉堡“霍夫曼和康培”出版公司1853年出版）。

- 4 出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2册第3首，指科苏特和马志尼。
- 5 全名为《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最初于1853年在瑞士巴塞卢由克·克吕西出版。
- 6 这是套用伏尔泰的一句话（“Écrasez l'infame”——粉碎无耻之徒）。

## 译者说明

上面发表的这封卡尔·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的信，是匈牙利埃特韦什大学历史学家提波尔·弗朗克新发现的。他在研究拉·科苏特领导下的匈牙利流亡者的历史的过程中，在匈牙利国立档案馆的瑟美列遗物中发现了这封信，并且在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1980年第4期上作了介绍。

这封信署的日期原文是1852年3月10日，可是信中提到的所有事件都明显地表明，正确的日期应是1853年。这封信是对以前已经知道的下面这封瑟美列致马克思的信的复信：

1853年2月20日[于巴黎]

我已经收到了您的信，可是我不能现在就作出回答。皮阿利写信告诉我（我和他并无通信关系），您曾要求他去科苏特那里把班迪亚的事通知他。这次授权是否同班迪亚对您谈到的那次一样是真的？我必须重复我的警告，对这两位先生都得提防。

我肯定地知道，科苏特的宣言是真的。他在这里的朋友们不仅劝告他，而且直接迫使他否认这个宣言，不然的话……您以为那个意大利人会高兴听到这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是 *par nobile fratrum* [高贵的兄弟俩]。我想这两位先生一定会因此发



生争吵。科苏特不仅显得在原则问题上摇摆不定，而且还分外地虚伪和怯懦。即使那个意大利人还继续同他合作，我恐怕不会再尊敬他了。

非常尊敬您的

瑟美列<sup>①</sup>

从瑟美列在信中提到马克思的头一封信来看，这肯定是马克思给瑟美列的第二封信。作为判断这封信的作者为马克思的根据的，除了它的内容多处与上面这封瑟美列致马克思的信相呼应以外，还有马克思的与众不同的笔迹和“查·威廉斯”的化名。马克思为了迷惑欧洲大陆的警察，在1859和1860年写给瑟美列的大部分信件也是用“A·威廉斯”或“威廉斯”署名的。此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这封信中多次提到马克思自己的著作，而且一字不差地插进了一大段马克思当时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通讯中的话。

马克思和瑟美列通信讨论重要问题，是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者历史中重要的一章。促使马克思和瑟美列相互接触的，是他们对科苏特的共同反对态度；瑟美列是科苏特的党派斗争对手，而马克思与科苏特则有原则性的分歧。科苏特同拿破仑第三相勾结，认为可以把拿破仑第三当作匈牙利解放斗争中的同盟者，他这种立场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评和揭露。马克思和瑟美列之间的通信就是在他们进行反对科苏特的斗争时开始的：1852和1853年是第一时期，中断了几年之后，在1859和1860年又进行了更频繁的接触。我们以前知道的马克思致瑟美列的十封信全都是属于第二时期的（收在《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9和第30卷中）。至于他们

---

<sup>①</sup> 这封信是第一次译成中文。

第一时期的通信情况，直至不久以前只能按照瑟美列致马克思的信来判断，这使得他们通信中涉及的复杂问题很难弄清。在这种情况下，新发现的这封马克思的信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封信谈到了拉·科苏特所领导的流亡者集团的历史中的三个重要问题：1) 科苏特在 1853 年米兰起义中的作用；2) 两个匈牙利流亡者古斯塔夫·泽尔菲和亚诺什·班迪亚的极其可疑的活动；3) 费伦茨·普尔斯基 1853 年去美国的使命。马克思回答了瑟美列关于头两点的疑问。瑟美列想要核实一下，马克思是否真的曾要求他们的共同熟人古斯塔夫·泽尔菲去“通知”科苏特关于班迪亚的活动；他再次警告马克思对这两个匈牙利人都要提防。瑟美列在信的后半部分极力想要马克思相信，在 1853 年 2 月米兰起义时发表的科苏特宣言是真的，并且科苏特已被“他在巴黎的朋友们”迫使后退。后来证明，科苏特这个宣言是在很早以前他流亡土耳其时为了号召驻在伦巴第的匈牙利军队拿起武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而写的。在米兰起义时，马志尼未征得科苏特的同意利用了这个宣言，按照新的情况改变了日期，修改了内容。科苏特得知之后，就否认了这个文件。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这封信还是大大增进了我们对马克思和科苏特周围的流亡者之间的关系的了解。以前我们知道，马克思把他从瑟美列那里得到的消息直接告诉恩格斯（见 1853 年 2 月 23 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而这封信很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把瑟美列告诉他的关于科苏特的情况直接用于寄往美国的通讯，并且他还打算在将来继续用瑟美列提供的资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关于匈牙利流亡者的文章。正象一些研究者所说的，使瑟美列和马克思走到一起来的，并不是他们观点的接近或某种共同的意识形态，而是瑟美列经常给马克思提

供主要匈牙利流亡者的活动情况，而马克思从原则立场出发利用这些情况写的反对科苏特的论战文章则被瑟美列看作是对他个人的支持。

研究已表明，密探班迪亚和泽尔菲（他又名皮阿利和希尔施）对马克思所起的作用是类似的。这封信中关于这两个匈牙利密探所说的话非常重要和有趣，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与科苏特的关系。马克思想要通过泽尔菲（当时马克思还认为他是诚实的）警告科苏特，要他提防与班迪亚合作的危险，这清楚地表明，尽管马克思抨击科苏特的立场，他还是认为这位匈牙利政治家是和他一起反对国际反动派的战友。瑟美列则不同，他不愿相信泽尔菲说的话，并且还直接写信给马克思来核实这一情况。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说到，他怀疑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著作被没收有班迪亚插手，这也是他传记中的新东西。马克思在别的信件中以及给报刊写的通讯中都没有提到过这种怀疑。

关于普尔斯基去美国的使命，马克思在1853年3月25日给阿道夫·克路斯的信中谈到过。这封给瑟美列的信中的新东西，就是它明确表示了马克思担心普尔斯基会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诋毁他。马克思产生这种担心的原因，可能是认为科苏特在给普尔斯基的指示中有具体反对他的内容。事实上，普尔斯基从科苏特那里得到的关于他的使命的指示，只是与《先驱报》等报刊谈判，要求它们“终止敌意”；他从美国回来以后给科苏特的报告中，也只是一般地谈到他到纽约以后如何想方设法“驱除报刊和人们关于米兰事件的坏印象”。多年以后，普尔斯基在回忆录中提到曾拜访《论坛报》编辑霍拉斯·格里利，但是对他们的谈话内容很少记叙。因此，马克思关于普尔斯基去美国的目的的消息来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这封信不仅有助于更确切地分析马克思与瑟美列的关系，也增进了我们对马克思关于科苏特的观点的了解。在关于马克思对 1848—1849 年革命的匈牙利流亡者的态度的文献资料中又增添了一个宝贵的文件。

#### **参考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29 和 30 卷；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第 4 期提波尔·弗朗克的文章《一封人们不知道的卡尔·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的信》。

## 奥古斯丹·梯叶里和唯物史观

〔俄〕格·瓦·普列汉诺夫

奥古斯丹·梯叶里<sup>①</sup>是复辟时代在法国复兴历史研究的著名学者的优秀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没有导师，也没有学生。但是它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派。考察一下这个学派的基本概念是极为有益的。

沙多勃利昂<sup>②</sup>曾经称这学派为政治学派。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坚信人民的状况完全决定于立法的十八世纪哲学家们，善于把“立法”仅仅同立法者有意识的活动联系起来<sup>③</sup>。这也是一种卓越的政治观。由此自然得出结论：每一个特定民族的民法应当把自己的起源归因于它的政治结构，归因于它的政府。哲学家们不断地重复这一点。

对于基佐说来，实际上恰好相反。他说：“大部分作家、历史家和政论家都力图用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明这个社会特定的状况，说明它的文明的水平或种类。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来认识和理解

---

① 本文登载在1895年11月《社会变化》杂志上。

② 沙多勃利昂：《历史研究》序言。

③ 在其他成千例子中间请参看马布利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的“考察”以及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著作。亚伯拉罕的宗教，起初似乎是为改革迦勒底人的迷信而想象出来的一种有神论；亚伯拉罕的有神论则被那个利用它来建立“犹太人的迷信”的摩西败坏。（参看《自然的体系》中译本下卷第185页。）“为了使斯巴达的改革不致仅仅昙花一现，他（李库尔）可以说进到了公民的心灵深处，而且在那里窒息了热爱财富的萌心。”（《马布利全集》1789年伦敦版第4卷第20页）。

它的政治制度，则会更合理些。制度在成为原因以前是结果，社会在受到制度的影响而开始变化以前创立了制度，不应当根据一个民族的政府形式来判断这个民族的状况，而应当首先研究这个民族的状况，以便判断它的政府应该怎样，可能怎样。”<sup>④</sup>

在这一点上米涅完全同意基佐。他也认为，政治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是结果。社会运动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利益，而且正是这个运动决定政府的形式。当政府不再符合民族的状况，它就会消失。所以，当人们需要有封建主义的时候，封建主义事实上还不存在；后来它事实上存在了，就不再符合需要了，因而最后它也就实际上不存在了。公社的解放改变了欧洲社会所有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它使得欧洲的政治进化朝新的方向发展。“民主制、专制君主制和代议制是它的结果；公社独占统治的地方是民主制；专制君主制同它们无法使之就范的国王建立同盟的地方是专制君主制；诸侯利用公社来限制王权的地方是代议制。”<sup>⑤</sup>

奥古斯丹·梯叶里同样不同意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观点。他说，宪法——这是社会的服装。旧的学派对国王的世系注意过多。它没有给人民群众的任何独立活动留下余地。“如果整个民族迁徙了，并且找到了新的居留地，那么，用编年史家和诗人的话来说，这是某个英雄要想为了显身扬名而建立帝国；如果新的习俗形成了，这是哪位立法者想出来要它形成的。如果形成一个城市，这是某个王公让它存在的；而人民、公民永远是某个人实现计划的材料。”<sup>⑥</sup>这样一来，叙述每个时代就变成了叙述立法者的出生、教

---

④ 基佐：《法兰西史论丛》1860年巴黎第10版第4篇，第73页。

⑤ 《论封建主义，圣路易的制度，等等》1822年巴黎版第83页。

⑥ 《论公社的解放》。这一研究是关于第三等级历史的著作的最初概述，刊登在1820年10月13日《法兰西信使》上。

养，叙述他的生和死。这种描写历史的方式对于中世纪的僧侣说来是天经地义的：僧侣作家们对那些给教会和寺院馈赠最多的人特别好感。但这种方式不是现代历史学家所应有的。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乃是真正的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公民的历史。“这一历史会同时给我们提供行动的榜样，并且引起我们在少数完全占据历史前台的特权人物的冒险行为中寻求不到的那种兴趣。在我们的心里，产生对于象我们一样地生活和感觉的人民群众的命运的依恋比产生对于人们向我们叙述的仅仅是权贵和王公的命运的依恋要快得多，而单单叙述权贵和王公的命运，我们是得不到有益的教训的。人民群众沿着自由和幸福的道路前进对我们会比征服者的进军更加印象深刻；——而人民群众的不幸比失去统治权的国王们的灾难更加触动人心。”<sup>⑦</sup>

因此，人民、整个民族应当成为历史的主人公。奥古斯丹·梯叶里怀着暗暗的愤怒谈到的无非是十八世纪历史学派不断援引的这些立法者（征服者）。不仅如此，在“公民”群众中，有特权人物和贫苦百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后者的生活上。“我们这些他们的子孙认为，他们什么都配得上，民族中为数最多和最没无闻的部分应该恢复在历史中的地位。如果贵族过去能够觊觎赫赫军功和军人的荣誉，那么平民也有荣誉——技艺和才能的荣誉。平民训练了贵族的战马，他们联结了贵族铠甲的钢牌；那些以音乐和诗歌给城堡中的庆祝增添欢乐的人们也来自平民；最后，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这是平民的语言；当贵族的庭院和城堡塔楼里传出日耳曼方言粗野的喉音时，平民创造了现在所说语言。”<sup>⑧</sup>

<sup>⑦</sup> 论法国历史的第一封信，载于1820年7月13日《法兰西信使》。

<sup>⑧</sup> 同上。

奥古斯丹·梯叶里不止一次骄傲地提醒说，他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是第三等级的儿子。他在一切方面都是这样的人。他站在这个等级一边；他的观点是平民同贵族斗争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也许这不只使一位读者感到惊奇。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第一个把这个概念引进了历史科学，——但这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以前它就引进来了，它在被沙多勃利昂不确切地称为政治学派并为奥古斯丹·梯叶里所归属的那个法国历史学派中就已经是一个中心概念。

对于基佐说来，全部法国历史都是阶级间的斗争、战争。在十三个多世纪的时期内，法国由两部分人民组成：一部分人民是胜利者——贵族；另一部分人民是战败者——第三等级。在十三多个世纪中，这些战败的人民进行了斗争，为的是摆脱掉胜利的人民所加的桎梏。斗争采取一切形式，运用各种武器；“当1789年全法国的代表们被召集在一起开会的时候，这两部分人民急忙恢复了自己原先的争吵；结束这些争吵的日子终于到来了。”⑨“革命改变了这两部分人民的相互关系；以前战败的人民成了胜利者，它也征服了法国。甚至复辟时期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宪章宣布，这个事实有其法律根源，而路易十八签署了宪章就做了新的胜利者的首脑。但是刚刚被战败的人民，也就是以前取得胜利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于自己的失败。他们继续进行自己原先的、十三个世纪来的斗争。而且在议会辩论时提出了问题，就象以前提出过的问题一样：是平等还是特权、是中等阶级还是贵族？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和平。使它们和解乃是无法实现的意图。使它们达成协议，也会是同样无法兑现的幻想。”⑩

⑨ 基佐：《论复辟时代的法国政府和现时的内阁》1820年巴黎版，第2—3页。

⑩ 同上书，第108页。



这里既不缺乏明白性，也不缺乏确定性。不过基佐善于用更加明白、更加确定的语言说出来。当他的政敌们在他的上述著作刚问世就谴责他煽动内战的时候，他回答说，他指出阶级斗争存在这个历史事实时并没有说出任何新东西。他写道：“我只想简略地叙述法国的政治历史。等级斗争充满，或者更正确地说，构成这整个历史(原文如此!)。关于这一点，革命前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知道并且谈论过。1789年人们知道并谈论过，三个月以前人们也知道并谈论过。虽然现在有人责备我说了这一点，我却不认为有什么人会记不起这一点。事实不会按照内阁和政党的善良愿望、为了它们暂时的方便而自行消灭。如果德·布伦维列先生回到了我们中间，听到有人否认第三等级曾进行反对贵族的战争，否认第三等级曾为了消灭贵族特权和确立同贵族的平等地位而经常跟贵族斗争，他会怎么说呢?如果那许多被派进议会去保卫或争夺自己等级的权利的勇敢的资产者复活过来，听说贵族并没有同第三等级进行过斗争，并没有在看到第三等级成长时惊慌起来，也没有总是阻挠第三等级增强自己的社会力量和巩固自己的影响，他们会说什么呢?”

整个这一斗争——“这完全不是理论，不是假设，这是最纯粹的现实本身，不仅看出这个斗争丝毫不是功劳，而且否认这个斗争也几乎是可笑的。”<sup>①</sup>如果贵族的某些拥护者想要忘记它，这是因为他们不再认为自己的等级强大得足以经受住公开的斗争，而且在他们看到自己的等级逐渐衰弱时就力图欺骗中等阶级。于是基佐以愤怒的政论家风暴般的力量猛烈地抨击了他们。他大声说道：“统治着辽阔的国家并且迫使伟大的国王们颤抖的那个种族的不可

---

<sup>①</sup> 前面所引著作最初两版的附录(第三版序言)，第15页。